



营救“七君子”：壮大民族统一战线

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，以己所能担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，也体现了上海的血性担当。

□记者 | 王煜

全面抗战爆发前夕，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类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。中国共产党号召之下，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的“全国各界救国会”颇具影响力。

然而，该组织的行为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，1936年11月23日，救国会的七名领袖被捕入狱，这就是“七君子事件”。在各界营救“七君子”的过程中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一致抗日救亡的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，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增强。

联合会抗日救国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三省迅速沦亡，日本紧锣密鼓筹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民族危急之际，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《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》，即《八一宣言》，提出了停止内战、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。同年年底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，北平学生发动了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，北平、上海、天津、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各界救国会组织。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提出：应在上海设立全国各界救国会，以推动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。

1936年5月31日，来自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开会，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（简称“救国会”）。大会讨论通过了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》等重要文件。

救国会提出主要政治主张是：第一，停止一切内战，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敌政权，团结一致共同抗敌；第二，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，实行民主政治，开放民众运动，召开各党派联合会议，建立统一的救国政权；第三，废除苛捐杂税，提高海关进口税，抵制日货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，在农村实行“耕者有其田”；第四，改变妥协外交，联合世界反日和反战力量，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。

同年7月15日，救国会的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陶行知等人联名发表《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》，赞同中共“停止内战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的主张，要求国民党



1937年7月31日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获释出狱前合影，左起：王造时、史良、章乃器、沈钧儒、沙千里、李公朴、邹韬奋。

政府停止“剿共”、一致对外。

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。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写信，表示“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，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”。

救国会成立后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成为抗战爆发前夕国统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，因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。1936年11月23日，国民党政府以“危害民国”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，史称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各界营救“七君子”

“七君子事件”震动海内外，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。

救国会发表宣言和告国人书，宣布不会因领袖的被捕而放弃抗敌救亡的主张，而是继续奋斗。宋庆龄发表了《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》，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。

国民党内部也对此事强烈谴责。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、冯玉祥、李烈钧等20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，要求“郑重处理”此事。广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也致电南京政府，请求无条件释